



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



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



扫二维码 看大学

教师们并不是反对评估本身,而是反对程序性的问题,以及政策过分频繁变动后难以快速适应的无助感。

被指标“俘虏”的教师靠什么“解脱”
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

如今,不少评估政策只问结果,不问过程。拿出的成绩单固然漂亮,但需要思考这是拿什么换来的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、未来的可持续性如何。从长远来看,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,不能只是简单“以结果论英雄”。真正的一流,重在管理、制度本身,学校要形成尊重一线教师的氛围,让他们心里踏实、有成就感。

“什么?毕业设计要求真实生产任务,否则无法通过教学工作量的考核要求?”

新工科 2.0 要求以真实生产任务的毕业设计代替毕业论文,急得一名没有横向课题任务的东部某高校老教师欲哭无泪,甚至放言“提前退休”。

他的担心并非没有由来。从去年到今年,这所高校的专业从 70 多个砍到 50 个,各类指标增加了 35%。去年因没有完成考核要求,被降级处理的教师就有 8 人。其力度之大,让教师们谈之色变。

“双一流”重视科研,本科评估强调就业率。看似都很有道理,但却忽略了指标内部的矛盾。冲击“双一流”,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,就业、实践就弱化了。“但本科专业调整又看重就业率,稍不留神搞得两头都不占。”该老教师说。

身处矛盾中进退两难,有些人便萌生“退意”。实际上,近年来,该校提前退休的比例也越来越大,延迟退休的比例反而逐年缩小。

近年来,类似全国高校新增、调整及撤销若干个专业、若干所大学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撤销若干个专业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,但很少有人关注新闻之外,因评估、考核指标而身心交瘁的教师们。

指挥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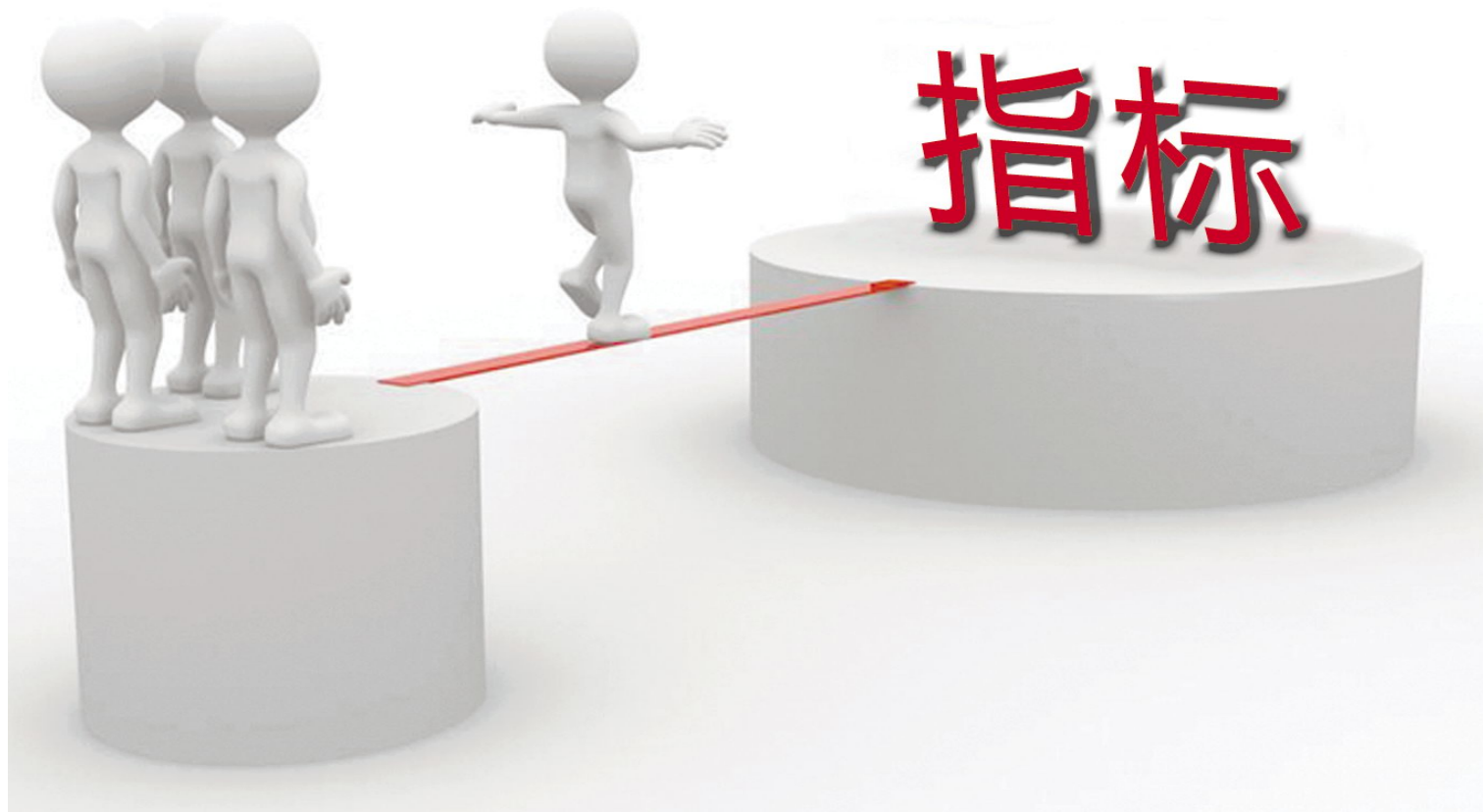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简单地理解老教师的经历,似乎可以把上述专业调整解读为“淘汰落后产能”。但究竟是教师无能,还是制度不合理,并不能简单下结论。

和很多高校一样,为了冲击“双一流”指标,老教师所在的东部某高校经历了一段迅速的“进入”时期。老教师的同事、该校教授张思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,这一时期看重科研,引进的人能写一手漂亮的论文,但对生产实践却知之甚少,“农林专业的老师,甚至连植物都认不全”,更有甚者,引进外籍教师,中文、英文授课皆困难,只能单纯搞科研。

随后,结合教育主管部门的学科评估、专业认证,该校迎来了剧烈的专业调整时期。专业调整以就业率为指挥棒,由 70 多个专业砍到 50 个。其中,虽不乏一些合理的调整,如裁撤因领导而设的专业、就业率过低的专业,但迅速进入的场景还历历在目,一些被裁撤专业的教师便陷入无生可教、无课可上的困境。

近年来,风向又转向了教学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多个场合说:“不重视本科教学的校长是不合格的校长。”

随着“双一流”、本科评估增加了教学权重,张思所在的高校领导对已是或有望冲击“双一流”的学科下了死命令。对省级、国家级科研课题的数量、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室的数量、国家教学成果奖等指标赋予了很高权重,“如果都为零,考核中一票否决”。



于是,专业认证、新工(农)科建设、在线课程、虚拟仿真实验室、金课建设……各种各样的教改如雪片一样,落在了教师头上。

张思所在的高校便出现这样一个趋势:“科研、就业均不行的专业,最先遭淘汰。科研差、就业好的专业,或科研好、就业差的专业,次之;科研、就业均不错的专业,是最安全的。”

“换言之,在‘双一流’、各类评估中能够为高校带来效益的专业、教师,在调整中最高枕无忧。”张思说。

专业大洗牌的背后,是强劲的资源驱动——跻身省前 100 名的学科,省里给予 1 亿元经费支持;“双一流”学科,省里、国家分别给予 3000 万元支持;学校的自主经费 40% 来自于各类头衔——这样的选择逻辑似乎“无可厚非”。

但“无可厚非”也带来层层相逼的马太效应——学校逼学院,学院逼导师,导师逼学生,给高校自身的安定带来重重隐患。

各种压力的承担者

在暴风骤雨式的各类评估中,教师是各种压力的承担者。

江苏省某高校教师汪林今年带了 4 名博士生,学校的规定,一名博士的绩效要求是 150 个点。“这是一个什么概念?发一篇 3 区的 SCI 才能达到,4 年要求完成 600 个点,相当于 4 篇三区 SCI。”

而这项规定的出台,学校并没有和一线教师协商,不管是否能够完成,也不管学生是刚入学,还是临近毕业。蛮干如斯,以至于国外的每个 SCI 期刊,都被中国相关专业的学生研究遍了,谈及杂志的周期、特点、发稿难易程度,学生可以娓娓道来。

“若学生完不成绩效要求,导师不让他毕业,出了事到底怨谁?真有一天,学校有一两起猝死、自杀事件就完了。”汪林自言,难以完成任务。

教学上也是“压力山大”,“从前科研不够、教学来凑,如今教学要求也水涨船高。跟不上形势,很快教学也要不达标了。”汪林感叹道。

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教学指标出台,譬如国家教学成果奖、在线课程、金课建设等,成为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。指标可以造,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,不惜一切代价砸钱办事,成为不少学校通行的做法。

拍摄一个虚拟课程需要投资 70 万元,汪林和不少同事感慨道,“连个小成本的电影都能拍出来了”。专业课程 64 学时,拍摄 64 个视频,持续时间 1 年,但是由于财务上的管制,尽管花费了大量精力、时间,教师却不能从 70 万元中取得任何报酬,校方通常会冠以“为你着想”的说法,让教师觉得理所应当。

因就业率取消专业被牵连的教师,更是有苦难言。张思眼,一夕之间,教师上了一二十年的课程突然被取消,或者调整到其他学科

了。“虽说真正的淘汰要经历一年考察期‘暂缓’,最后从教师岗位退出的人并不多,但对于那些无课可上、无生可教、科研任务不饱满、转岗困难的教师,矛盾已经越来越激化了。”

评估要关注节奏和科学性

在讲究投入和产出的当下,将作为参考依据的评估取消了之,并不是一个万全的办法。

“教师们并不是反对评估本身,而是反对程序性的问题,以及政策过分频繁变动后难以快速适应的无助感。”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说。

目前,政策所体现的“简单粗暴”是显而易见的。在评估间隔时间短,几乎没有时间对评估本身做认真的反思,并在此基础上对原有政策作出完善。决策部门较少考虑新旧评估指标、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,制度设计时容易出现新旧指标前后不协调的情形。

在侯定凯看来,整体政策变革的节奏非常重要。频率过高,很多项目尚未开展就进行评估,教师就会出现无所适从的情况。而且,各部门都是按自己的节奏执行上一级的政策,很多时候基层教师要接受时间要求上相互冲突的指令。在政策执行节奏混乱的情况下,如遇政策执行不当,便难以判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

如何打开死结?可以借鉴国外高校科研评估的先例。上世纪 80 年代,英国高校科研评估制度推行之初,两次评估的间隔时间也比较近(大约 3 到 4 年),但如今却越来越长了,间隔达 6 到 7 年。为什么要拉长两次评估的间隔?间隔期间究竟在做什么?

据侯定凯介绍,英国政府部门在进行下一次高校科研评估之前,通常会先对上一次评估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反思,以便为新评估工作的调整作准备。政府通常会公布调查报告中,融入了大量个案分析、不同教师的评论和建议。由于需要花时间进行广泛的意见征询,数据收集和分析,并撰写报告,新评估政策自然难以很快推出。

而我国很多政策出台后,虽也有后续反馈、调查动作,但谁参与了这些调查,人们不得而知,对新政策实施的调查和评估结果,外人更不得而知。

“最重要的两点:一是决策程序的合理性、公正性,需要相关立法跟进并在程序上作规定;二是需要第三方针对新政策的实施开展及时、深入的调查和评估,特别是更好地倾听一线教师的意见,并反馈到下一次决策中。”侯定凯说。

此外,评估指标设置的科学性,尤其是就业率能否作为专业调整的依据,也备受本次受访者质疑。

在英国的高校评估指标中,学科的社会影响力是最为人诟病的指标之一。因为人们很难拿出证据证明,某一项社会进步成效是由某一

大学某学者的特定课题或论文直接产生的。

“一旦将评估与外在的指标(如就业率、或者科研的社会影响力)联系起来,就要非常谨慎。问责对象把板子打在特定的专业和教师身上是否合理,指标本身的设定是否赋予了太大的权重、是否太过简单化,都是要考虑的。”侯定凯说。

尤其是在我国,大学就业率失真已是“公开的秘密”。北京科技大学教授、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潘伟指出,在一些高校内部,学生就业统计中还赫然出现“灵活就业”一栏,其中意味耐人寻味。

侯定凯补充,有时政府貌似按市场导向(如就业率)进行评估,其实恰恰是反市场的做法。由于大学人才培养没有形成市场反应机制,只能通过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加以“调节”,对学术活动“伤筋动骨”的影响在所难免。

减少不确定性,高校应有所为

中国教师的流动性不强,多数人持“铁饭碗”“待一辈子”的观点,也是目前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。在潘伟看来,虽然人们佩服在某一领域将板凳坐穿坐透的教师,但对于更大范围的教师而言,应该提高自身适应能力,为岗位调整做多手准备。

记者了解到,在国外,大学教师的不稳定性是常态。在美国,由于州政府预算缩减,在英国,由于强调投入与产出的问责,兼职教师、临时聘用教师的情况越来越多,固定的教师岗位逐渐减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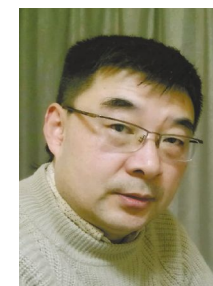
“前提是能不能一刀切,今天决定了,明天就撤专业。急刹急停带来的风险很大。”潘伟举例,在国外,不想办某一个专业,做法比较委婉,通常会减少专业拨款、教授席位、升迁机会,这时候教师自然而然会发生转移,选择其他方向或院校。

这其中,高校的调节和缓冲作用不可或缺。国家出台不少政策只是大框架,给高校留有一定空间。侯定凯指出,高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,需要处理好外在变革和基层稳定之间的矛盾,高校或下一级学院应发挥政策缓冲地带的功能,而不是加剧新政带来的不确定性,这也是教师最害怕的事情。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才是教师个人发展的前提。

可预见性、计划性甚至朝令夕改的校方决策,虽然从硬指标上看没有漏洞,但在诸多细节上,对教师群体士气和学术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,也对大学的长远健康发展不利。

侯定凯认为,如今,不少评估政策只问结果,不问过程。拿出的成绩单固然漂亮,但需要思考这是拿什么换来的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、未来的可持续性如何。从长远来看,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,不能只是简单“以结果论英雄”。“真正的一流,重在管理、制度本身,学校要形成尊重一线教师的氛围,让他们心里踏实、有成就感。”

中国大学评论



尤小立

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

近日,山东大学针对外国留学生的“学伴”项目在网络和纸媒上不断发酵,争议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。所谓公共话题往往具备两个特征:一是牵涉的问题比较大,二是涉及的面比较广。

山东大学的“学伴”项目实施办法涉及国家对外国留学生的政策、外国人在中国的待遇、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等等,问题不可谓不大,涉及不可谓不广。

比如外国人在中国是继续享受“超国民待遇”,还是“国民待遇”,就是涉及面广的大问题。随着我国开放程度加大,一方面在华外资、外企和外国人越来越多,另一方面,国际规范和惯例的引进也在促使与此相关的权利意识的觉醒。此次争议最有价值的地方,就是它让基于国际规范和惯例的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得以清楚表达。

然而,有关“国民待遇”的问题在现实中也相当复杂。古代中国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的传统本身就含有主客不同的意思,哪有把客人也当成主人一样看待的道理?这个传统在不同时代虽然表现不同,但基本观念却是相同的。从好的一面看,对外国人表达友好之情,恰是国人在处理中外关系上的优异之处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那种单纯从法律上看问题,以为外国人根本不是中国公民,按照法律上责任与义务的对等原则,他们不应该享受“国民待遇”的意见不仅失之偏颇,也曲解了“国民待遇”的含义。如果没有给予在华外国人以“国民待遇”,而以其所属国法律进行管理和裁定,等于是承认“治外法权”的合理性了。

可是,优待“远方宾朋”也需要有个“度”。山东大学虽然继承了山东人一向豪爽大方的传统美德,但拿着公共资源去“以三配一”显然超过了这个“度”。

给予在华外国人以“国民待遇”或许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有关,但决不能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,就必然可以自信到平等待人。经济条件从来都只是基础,它的发展水平与修养程度、处事方式从来都不是同步的,也不可能必然地促使人们反思。网络上出现的对外国人蔑视或不敬的言论,多是打着谋求“国民待遇”中外平等的旗号,似乎借助“正义”就可以所欲为。

这是误以为动机正确,便可以不讲规则和程序。殊不知,动机与规则、程序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,因为人的因素有不可预测性,动机与规则、程序不可能天然契合,而规则、程序往往决定了动机的达成是否合理。有意思的是,面对批评,山东大学以“国际事务部”名义发表的第一次声明所以文正辞严,也是因为他们认为“学伴”项目的动机是好的,关键是“不违法”,却没有考虑到项目的具体规则、程序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。

不过,媒体或网评中所说的,山东大学“学伴”项目的实施规定是“自卑”心态的体现,或是“自作多情”,甚至是“不爱国”,也未免言重了。笔者更愿意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一种长期养成的工作习惯。

大学教师都有这样的经历,去学校机关办事经常会遇到办事人员说:“下次(或明天)再来吧。”他们说得很轻松,甚至头也不抬。可是,现在大学都有几个校区,下次(明天)来一趟不消耗大半天时间不可。

类似这种不顾社会进步的落后的行政习惯,也决定了山东大学有关部门办事的方式。因为与北上广相比,济南有明显的地域劣势,既然上面有相关的鼓励政策,为吸引国际学生就需要“创新”,北上广的大学是配一个“学伴”,参照 GDP 的数值关系,山东大学觉得配一个不行,两个也不够,干脆顶格到三个;为吸引学生参与,再加上“结交外国异性友人”的选项。

落后的行政习惯也显示在公关方式上。这类陈旧的公关方式的特点,就是盲目自信,即一旦项目实施就不允许外人置喙,否则就是“别有用心”,这等于自愿放弃了弥补错误的机会。现在看,不仅是批评者,就是“学伴”项目的亲历者也不满意山东大学的事后公关。只是与批评者不同,亲历者的不满不是因为“学伴”项目本身的缺失,而是觉得山东大学没有能够通过媒体公关将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

当然,过度热情地对待在华外国人的不止山东大学一家,福建林业大学对拟推举交警的留学生的处理、南京地铁管理方对中外人士的不同待遇,都有遵循以往行政习惯而失之于“度”的问题。而这些问题是需要通过继续改革开放和不断学习、改变观念才能解决的。一百年前,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评论“家庭革命”中的极端倾向时说:“现在有一班青年……他并没有将爱情(即今之亲情)扩充到社会上,他却打着新思想、新家庭的旗帜,抛弃了他的慈爱的、可怜的老母;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?”

这段话也适用于今天提出对在华外国人实行“国民待遇”的诉求者和政策制定者。简言之,我们固然要提倡“国民待遇”,无论中外、一视同仁,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中国人一向善待“远方宾朋”的好传统。

换个视角看山大『学伴』项目及其争议